

顧問

盛成

劉蕙孫

嚴薇青

編撰

方寶川

太谷學派遺書

第三輯 一

◎ 中國儒家最後一個學派

◎ 口耳相傳的神秘學派

◎ 全部第一手資料

◎ 首次全部面世

顧問 盛成

劉蕙孫

嚴薇青

編撰 方寶川

太谷學派遺書

第三輯 一二

◎ 中國儒家最後一個學派

◎ 口耳相傳的神秘學派

◎ 全部第一手資料

◎ 首次全部面世

顧問

盛成

劉蕙孫

嚴薇青

編撰

方寶川

太谷學派遺書

第三輯 三

◎ 中國儒家最後一個學派

◎ 口耳相傳的神秘學派

◎ 全部第一手資料

◎ 首次全部面世

顧問 盛成

劉蕙孫

嚴薇青

編撰 方寶川

太谷學派遺書

第三輯 四

◎ 中國儒家最後一個學派

◎ 口耳相傳的神秘學派

◎ 全部第一手資料

◎ 首次全部面世

太谷學派遺書

第三輯 五

顧問 盛成

劉蕙孫

嚴薇青

編撰 方寶川

- ◎ 中國儒家最後一個學派
- ◎ 口耳相傳的神秘學派
- ◎ 全部第一手資料
- ◎ 首次全部面世

方寶川

3

太谷學派遺書

第三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太谷學派遣書. 第三輯 / (清) 劉大紳 等著; 方寶川編. 影印本.
-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11
ISBN 7-80643-647-2

I. 太… II. ①劉… ②方… III. 古典哲學-中國-清代 IV. B249.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88332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社書陵廣: 劃策輯編

定 價	印 刷	經 銷	出版發行	編 著 者
680.00 圓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江蘇揚州市鳳凰橋街 24-6)	廣陵書社 (江蘇揚州市中央路 155 號)	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55 號)	太谷學派遣書 劉大紳 等著 方寶川編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開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92.3125 印張

序

劉蕙孫

太谷學派是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安徽池州石埭人周太谷所創立。太谷名穀，字星垣，號太谷，又號空同子。太谷學派初無其名，太谷和其門弟子最初都自稱為『聖功弟子』。『聖功』之意，出自於《周易·蒙卦》：『蒙以養正，聖功也。』意思是說，宇宙與人都秉賦自然界的生機而產生、發展和作用的。一般的人則是隨此生機而生而沒而轉化。能够養得其正者，則可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共明』，這就是所謂『聖功』。『聖功』也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明德』，《論語·顏淵》中『視聽言動』之『視聽』作用。視聽的作用在於認識客觀存在，所謂『視思明，聽思聰』。但所謂『耳目聰明』，並不是一般所說的眼睛亮，耳朵尖，而是《周易·繫辭》所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換句話說，就是『視聽』本能的感應作用。經過這樣『視聽』的本能，以『言動』支配客觀一切，使它盡美盡善，即《大學》所謂：『在止於至善』。《莊子·天下篇》稱前者，即『視聽』的認識作用為『內聖』，後者命令支配的成果為『外王』，就此

是『內聖』與『外王』之學。而『內聖』和『外王』又是相互作用的，這種相互作用是通過養正而取得。千古儒家的學問根本就在於此。由於後世儒者不理解『內聖』、『外王』的相互作用，而把『內聖』、『外王』分成兩截，專以人知用事，『內聖』之功遂不存於人世。只有《大學》所說『致知在格物』、『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進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纔是儒家學說一貫之道理。因其關鍵在於修身，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太谷之學是他早年奔走四方尋求安身立命之道後，借鑒佛道，得到儒家『內聖』、『外王』的一貫真理，纔提出的『聖功』學說，以做一個『聖功』弟子，來作爲自己及門人的奮鬥目標。由於周代以後，一般人不學儒學的根本，以爲從『致知格物』達到『治國平天下』的這種『內聖』、『外王』的一貫關係，就是爲了維持封建統治所制定的一套人與人關係的制度。到了明朝晚期，更有人認爲程朱理學也是迂腐的，『口言仁義道德，心存高官厚祿』就是儒家。太谷『聖功』之學則強調身心性命，許多人說他是受了佛、道的影響，合三教爲一，甚至以爲是受到福建莆田林兆恩三一教和江蘇松遼陳智的『三教一家』之說的影響。其實太谷在《周氏遺書》中是絕口不談佛、道，書中所謂『二氏』是指《論語》中所說的老、彭。太谷弟子張石琴，爲了講學方便、世俗易懂，纔談到了佛、道。但在其《與秦雲樵書》中，對佛、道之學的態度已說得很清楚了，『聖功之學』實非三教

合一。又因爲找不出學派的淵源，人們就任意爲之命名，如『泰州教』、『太谷教』、『大學教』、『空同教』、『黃崖教』等等，全是旁人所虛構。太谷學派之名是出自一九二七年盧冀野先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太谷學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一文，盧氏是鍾泰的學生，鍾泰（字鍾山）又是黃葆年的門下，對於太谷學派有一定的瞭解。學術界認爲這個名字較爲妥當，遂固定沿用了下來。

太谷學派的實際淵源，其再傳弟子謝逢源在所編《龍川夫子年譜》中說：『包羲天子也，文王諸侯也，周公卿大夫也，孔子陪臣也，太谷庶人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意思是說，太谷之學與一般的小儒思想是大不相同的，是和義、文、周、孔一致的。但學派中的其他一般門人，對謝逢源的話却理解不透，說太谷是直承義、文、周、孔而來，太谷學派的道統應是『義、文、周、孔、周。』這實際上是一種誤會。周太谷在《周氏遺書·進學解》中自說：『學者果能循朱、張、程、程、周、孟、思、曾之緒，而後尋孔、顏之樂，復與幾存義之德，庶不負斯進學之解云』。又在同篇中特別寫了一個《道州節》，『道州』指的是濂溪周敦頤，從而更明白地說明了太谷之學實際是淵源於宋學。『義、文、周、孔、周』中的最後一個『周』，實際是指周敦頤。過去沒有見到學派的遺書，范文瀾先生在延安本的《中國通史簡編》中稱：太谷學派是『王學』（陽明）的左派。我也如是誤解。後來范老見到資料後，就把這種說法去掉了。現我也在此糾

正這一錯誤。

關於學派的遺書，本來儒家講學是口口相傳，專述前王之道，所以孔子說是『述而不作』。太谷逝世前，遺囑門弟子說：『文章在笥，予之傳其在是矣！』汪全泰遂將其全部文章帶回加以整理。後來張石琴在山東黃崖講學，汪又全部將此轉交張石琴。因為其主要內容都是解答其及門弟子所問的『九經』、『四子』中有關『內聖』方面的文章，張石琴就將此編爲《十三經或問》，後又以其他的文章附之於後，合稱爲《周氏遺書》。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山東巡視閫敬銘的部下因貪功而污蔑張石琴爲教匪，發兵圍剿。石琴及門弟子不屈，舉山自焚而死，死者多達兩千多人，所藏遺書因此也付之一炬。按：太谷弟子中最早有陳一泉，原是一佛家；另有韓仰瑜，本是一道家。當初太谷則是他們的門下。太谷悟道後，陳、韓反拜太谷爲師。道光初年，太谷到揚州講學，又有進士出身的汪全泰拜在門下。太谷曾給汪全泰寫過一封信，云：『爾孝爾慈爾尊師爾仁民，予門微陳、韓，皆不及爾矣。』到了晚年，又得到儀徵人李光炘、張石琴，共爲五大弟子。黃崖事後，汪全泰避禍，在京作部郎，絕口不談學派之事，他的文集中也隻字不提。假如沒有太谷學派遺書的資料，人們就不可能知道他與太谷學派的關係。

黃崖事後，除去陳、韓二人終於方外，太谷學派的主要傳人是李光炘（龍川）。由於黃崖事件在當時是被定爲叛逆，學派的活動遂轉入地下。不久，李龍川得到了曾國藩的諒

解，又開始較公開地在大江南北講學。我的祖父鐵雲先生劉鶚是李龍川的門下。清光緒庚子後，黃崖案得到昭雪。此時李龍川等人均已作古，過去的事件也漸爲歷史所沖淡。一九〇二年，鐵雲先生和同門毛慶蕃、程恩培、楊士晟等就合議在蘇州葑門內十全街建立一個學舍，請原在山東作縣官的黃葆年和在江北小規模講學的蔣文田作爲學舍的主講，黃正蔣副。又因爲蔣在江北講學是爲了繼承黃崖張石琴的道統，故稱之爲北宗，黃葆年則爲南宗，是爲南北合宗。由於此時星散在四面八方的龍川弟子又漸漸回到蘇州，取「牧馬歸群」之意，命其學舍爲「歸群草堂」。鐵雲先生是歸群草堂的骨幹，我的姑母也嫁給黃葆年次子黃壽彭，我的父親貞觀先生劉大紳拜從黃葆年門下，我的繼祖母也是黃的門人，我們一家與太谷學派的關係可以說是很深的。我在小時候，只見過一本《龍川詩鈔》，稍大點又聽說《周氏遺書》共抄了十二部，分給黃、蔣、楊、劉等門人，但我們從未見過，也未聽說過還有其它的遺書。歸群草堂的黃、蔣兩先生逝世後，一九二五年首座李平孫先生繼位，不到一年李也作古，歸群草堂遂失去了合法的繼承人。我的姑丈黃仲素（壽彭）請蔣文田夫人以師母身份令他主講。此時，歸群草堂的經濟支持者劉、毛、楊、程諸家的老輩都先後作古了，因此草堂日漸不景氣。本來有些門下經常由草堂給予相當的生活津貼，此時也辦不到了。我的繼祖母鄭氏老太太，本來是草堂女生的學長，一九三六年到天津我家就養。她把鐵雲先生珍藏的一部《周氏遺書》也帶到天津，我父親與我們這纔第一次看到

太谷學派的主要著作。我們覺得學派思想與平時傳聞是完全不同的。我父親本是學西洋哲學的，後也研究陽明心學與佛學，名義上雖是黃葆年門下，但實際上接觸并不多，因有了《周氏遺書》，纔深入研究。我們在天津家的鄰居中有一位著名的中醫潘孝侯（葆真）先生，是我父親的表兄，也是黃葆年的門下，但他當時手中連《龍川詩鈔》也沒有，向歸群草堂要，也說沒有。我父親就和他商量，現在同門中許多人要這本書而得不到，我二人不妨合印此書，贈送給大家。於是就印了三百本，內容除去詩以外，還把《李氏遺書》及我祖父在世時石印的李龍川《素隱術》及幾首原詩集未收的詩一并刊印發行。印成後先是寄奉幾十本給歸群草堂，請代贈同門。二人以爲這是好事，意想不到黃葆年嫡傳弟子一代中以黃仲素爲首，聯名來了封信，譴責我父親和潘孝侯先生，說這是泄漏天機，罪無可赦。并指出挽救的辦法只有將《李氏遺書》那部分拆下來，燒成灰，用黃綢子包了，雇一小船送到揚州江心，在人間不留片紙隻字。《龍川詩鈔》則要全部重新裝訂，送到揚州的龍川草堂保存，不准私自送人。門弟子中想請《龍川詩鈔》的，可以寫信給歸群草堂，經全體討論決定後，再贈送一本。我父親與潘先生看了來信後，不大理解。潘先生主張不予理睬，我父親則主張與他們辯論。遂由我父親執筆，寫了一封好幾千字的長信，辯論說：在當初《遺書》不敢示人是因為有黃崖教案的關係，現事隔數十年，黃崖教案已呈請昭雪了，歸群草堂也創立三十餘年，爲何還要保密？孔孟之書、佛道經典，爲何也可公開刊行，而不

保密云云。蘇州的一些門弟子見信後，認爲此信說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同時也沒有力量控制，遂不了了之。但意料不到，在來信具名人中有一位叫張令貽（名德廣）的，見到此信後，又單獨來信與我父親說：歸群草堂舊藏的有些遺書本來很零亂，他個人投資，經黃葆年同意已整理抄清，共得八十餘種。歸群草堂中一些家境貧寒的門人就以抄寫費資助。因他個人經濟實力不夠，還曾回家變賣田產來辦此事，所以蘇州人稱他爲「張三瘋子」。又說：我父親與潘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因而也就把他自己所編抄的遺書書目寄贈一份。張令貽是程恩培的內侄，和我家還是親戚。由此，我們纔知道原來太谷學派還有這麼多的遺書。幾年後，我們搬家北京，遇到一位汪中方先生，也是黃葆年門下。得知此事後，他就登門來要《詩鈔》，亦認爲蘇州那些同門思想太保守了。并說：先生（黃葆年）當時也并非不給人看遺書，門弟子要求讀的書，還是時常指定讓人抄。他自己就已抄存《張氏遺書》、《觀海山房追隨錄》、《十三經或問序》和《濂溪一滴》等幾種。後又將他所抄者借給我們傳抄，我們這纔又見到了《周氏遺書》和《龍川詩鈔》以外的學派遺書。

抗日戰爭時，蘇州淪陷，我姑母已死，姑丈黃仲素等人就去江北泰州避兵。但歸群草堂的房子依然保留。抗戰勝利後，姑丈回到蘇州，不久與張令貽等先生先後作古。而張先生所編的《歸群寶籍》均歸草堂所有。解放初期，我父親歸養蘇州，還陸續從草堂中借抄了部分遺書。但好景不長，草堂房東賣房拆遷，所存遺書由我表兄黃花農（玉琪）全部收

藏，再不許家人外借了。《南京理工大學學報》（哲社版）一九九三年第四期發表的孫慶飛《太谷墓與太谷學派活動》一文披露：據李興甫口述，一九五一年寒假左右，「蘇州一詹姓門人，將手抄本《太谷遺書》外傳，李興甫等人雇船於蘇州河上，逼詹姓人交出全部藏書，於河面上焚毀。」

因為太谷學派的組織活動和思想內容，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上是個空白與斷層，學術界對其十分關注。尤其是范文瀾先生，得知劉鶚是太谷學派的骨幹，就一再向我瞭解有關學派的内容及有否遺書行世。解放之初，我聽說有些遺書交歸蘇州圖書館，就立即寫信向范老匯報，建議將全部遺書收歸國有，組織力量研究。范老親筆回信說：這樣做是應該的，只因建國之初，百業待興，國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得待來日再說。又要求密切注意情況并及时聯繫。我如命將原信收藏，可惜文革期間亦被破『四舊』給抄走了。一九八八年，江蘇淮安成立劉鶚故居，召開『劉鶚誕辰一百三十周年紀念暨《老殘遊記》學術討論會』，我們應邀出席。當時出席大會的人一致認為：要研究劉鶚思想，一定先要研究太谷學派。泰州宣傳部門的領導在會上稱：在文革破『四舊』時，太谷學派門人手中的遺書大都散了出來。後以泰州圖書館為主，訪求搜集了四十餘種。時又有一些人不贊成公開流通，但有一老人蕭齊先生，其父為黃葆年的門下，則極力主張流通，并組織了一些老人家，在泰州東門新華書店古籍組，代人抄寫。只要有人訂購，就予代抄。福建師大圖書館

方寶川同志遂與之聯繫，訂購了一套凡三集二十六種五十三冊。一九九一年十月，我與方寶川同志及德國漢學家屈漢斯博士一起到蘇州、揚州、儀徵、泰州等地考察太谷學派遺迹。在泰州市政協副主席楊本義先生的安排下，我們到了泰州圖書館，看到了該館珍藏的所有學派遺書。得知泰圖所藏，大都也是傳抄本。至此，我所見到的原抄本，一是鐵雲先生舊藏的《周氏遺書》，文革間怕遺失，贈送給了浙江省圖書館。二是抗戰期間，在北京琉璃廠發現過一部裝璜版式與我家完全一樣的一部《周氏遺書》，據說也是所謂十二部之一。三是現存我家謝逢源稿本《龍川弟子記》。四是現藏泰圖的李龍川硃批《孟子》七篇。這些藏本，均彌足珍貴。由上可見，保存、流通或禁錮、消滅學派遺書，在思想上是有鬥爭的。為什麼會如此？至少可以說是認識的不同。

一九九五年，方寶川同志提出了編輯出版《太谷學派遺書》的計劃，很快就得到了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王明發主任的大力支持，並呈請、得到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資助。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王主任親臨福州，與我及寶川同志共同磋商研究，我表示了我無條件提供所藏資料，由方寶川同志具體負責編撰工作，初步決定分三輯印行。其內容：第一輯為周太谷等學派各代主要傳人的遺書、語錄及有關書目資料；第二輯為學派門人詩文集；第三輯為學派門人對儒家經典及佛、道典籍的批注、學術專著及其它編著。

在保存、流通和研究學派遺書的過程中作出較大貢獻的，首先應該提出的是張令貽先

生輯抄《歸群寶籍》；其次是文革以後，泰州市有關部門訪求搜集，特別是蕭齊老先生主持傳抄；其三是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的王明發主任和方寶川同志奔走組織，共同完成了《太谷學派遺書》的編印任務。寶川同志曾問學於我，研究太谷學派多年，治學嚴謹，尤擅考據，頗多成績。曾作爲訪問學者赴德國慕尼黑大學與屈漢斯博士合作研究太谷學派的有關課題。此次他提出計劃，要我作顧問，爲之撰寫序言，并代懇盛成和嚴薇青兩教授，俞允爲顧問。因爲我的家庭與學派的關係，刊印遺書更是我數十年來的心願，於是我就當仁不讓，將我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略述如上。可以說，該書的編撰出版，填補了太谷學派研究史上文獻無徵的空白，對學術界進一步全面研究太谷學派的活動及其主要思想，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至於我個人對太谷學派思想不成熟的認識，今亦借此機會簡述如下：

一、學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民間的暗流。千古以來，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太谷學派認識到了這一點，認爲地主土地所有制是農民最大的痛苦，力主土地歸國家所有。不但這麼主張，而且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照此進行。如周太谷本人就是一個大地主，認識這一點之後，除留了點糊口養家的田地之外，全部分給了無地和少地的親友、佃戶。

二、學派認爲人類最大的苦惱是生命短暫，所有的英雄豪杰均不能免。各種的宗教，